

金瓶梅評注

蔡國梁選編



蔡国梁 选编

金瓶梅评注

漓江出版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93475

1093475

金瓶梅评注

蔡国栗 选编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1.75 插页4 字数507,5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7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256·195 定价: 3.85元

目 录

论 文 选 辑

明人清人今人评《金瓶梅》·····	蔡国梁 (3)
金瓶辨·····	阿 英 (22)
谈《金瓶梅》·····	聂绀弩 (24)

《金瓶梅》引言·····	[英]阿瑟·戴维·韦利 (32)
张竹坡对《金瓶梅》的评论·····	[美]戴维特·罗依 (42)
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·····	[法]安德烈·勒维 (50)
评《〈金瓶梅〉的艺术》·····	[法]安德烈·勒维 (60)
《金瓶梅》在日本·····	冀振武 (66)

《金瓶梅》创作时代考索——兼与吴晗同志商榷

《金瓶梅》著作时代问题·····	龙 华 (70)
金瓶梅非万历中期作品·····	[台湾]魏子云 (94)

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·····	李长之 (103)
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·····	痴 云 (117)
《忠义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词话》·····	黄 霖 (126)
《红楼梦》和《金瓶梅》·····	徐朔方 (144)
《红楼梦》与《金瓶梅》比较兼论性的描写·····	傅憎享 (153)
《金瓶梅》与古代世情小说·····	黄 霖 (174)

试论西门庆·····	刘绍智(185)
试论西门庆的阶级出身·····	李新祥(201)
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·····	张天畴(214)

金瓶梅版本之异同·····	姚灵犀(219)
《金瓶梅》的重要版本·····	滋 阳(225)
翁序·····	[台湾]翁同文(228)
苏序·····	[台湾]苏同炳(236)
《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》弁言·····	[台湾]魏子云(239)
《瓶外卮言》序一·····	(245)
《瓶外卮言》序二·····	(246)

麻城刘家和《金瓶梅》·····	[美]马泰来(247)
诸城丘家与《金瓶梅》·····	[美]马泰来(259)
有关《金瓶梅》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·····	[美]马泰来(275)
现存《金瓶梅词话》是《金瓶梅》的最早刊本吗	

——与马泰来先生商榷·····	刘 辉(279)
从金瓶梅的问世演变推论作者是谁·····	[台湾]魏子云(284)
《金瓶梅》成书新探·····	徐朔方(298)

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·····	阿 丁(343)
金瓶梅的价值·····	[台湾]孟 瑶(355)
屠本峻的《金瓶梅》跋语·····	刘 辉(362)
谢肇淛的《金瓶梅跋》·····	[美]马泰来(380)
《新刻绣象批评金瓶梅》评点初探·····	黄 霖(386)
略谈文龙批评《金瓶梅》·····	刘 辉(398)
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·····	陈昌恒(403)

金瓶梅词话中的音乐史料·····	冯沅君(417)
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·····	涩 斋(427)
说金瓶梅传奇零折旦剧第一·····	陈墨香(435)
金瓶词曲·····	姚灵犀辑(442)

注 文 引 录

金瓶小札·····	姚灵犀(457)
《金瓶梅》词语选释·····	张远芬(583)
《金瓶梅词话》特殊词语例释·····	白维国(646)
谈《金瓶梅》的方言·····	郑庆山(658)
从《金瓶梅》考察十六世纪中叶北方话中 的儿化现象·····	李思敬(667)

专 著 附 介

《瓶外卮言》	姚灵犀编著(635)
《金瓶梅考证》	朱 星著(685)
《金瓶梅新证》	张远芬著(685)
《金瓶梅考证与研究》	蔡国梁著(686)
《〈金瓶梅〉与张竹坡》	吴 敢著(687)
《金瓶梅探原》	〔台湾〕魏子云著(687)
《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》	〔台湾〕魏子云著(687)
《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》	〔日本〕泽田瑞穗编著(689)
参考书目·····	(690)

论文选辑

明人清人今人评《金瓶梅》

蔡 国 梁

历来评论《金瓶梅》集中在两个问题上：一、作者；二、褒贬。

自《金瓶梅》问世至今，人们争论最多最热的是：《金瓶梅》是谁写的？它涉及到作品的人物、题材、主题、源流、民族形式，即真实性、时代性、继承性与艺术的综合运用、传统表现手法诸问题。因而自然会引起普遍的关心。它的讳莫如深，开了一代风气。我们知道，匿名、托姓是明末清初小说常见的，这固然与文坛视诗文为高雅、说部为猥琐的时风有关，但也可能因专制政治的酷烈易贾祸，或其人皆深极愤懑，有不可告人之隐，于是委曲譬喻而出之，总之是不愿不敢罢了。

《金瓶梅》尚未付梓、其抄本正在流传时，学林已有种种推测。

其一为袁小修（中道）于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在其兄中郎（宏道）家看到《金瓶梅》后所说：“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，延一绍兴老儒于家。老儒无事，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，以西门庆影其主人，以余影其诸姬。”（《游居柿录》）

其二是成于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前后的沈德符的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，其《词曲》的“金瓶梅”条下谓：“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”。

其三系收于《小草斋文集》（现存日本尊经阁文库）卷二十四的谢肇淛的《〈金瓶梅〉跋》：“《金瓶梅》一书，不著作者名代。

相传永陵（明世宗朱厚熜墓陵，用以代指）中有金吾戚里，凭怙奢汰，淫纵无度，而其门客病之，采摭日逐行事，汇以成编，而托之西门庆也。”因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袁中郎有信追索前借给谢肇淛的《金瓶梅》，则此跋必作于是年前后。谢此说正与丁巳年的《金瓶梅词话》本《甘公跋》所说“《金瓶梅》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”呼应，世庙即明世宗嘉靖。

袁小修、沈德符、谢肇淛都是明万历间人，距离《金瓶梅》成书时间较近，或者可说是《金瓶梅》成书时还活着的人讲的话，虽不能说确凿，也似乎较为可靠，于是人们顺着这条道儿，大做文章，尤其是沈德符的话几乎成了经典，既系“大名士”，又出“嘉靖间”，考证不休，猜测未已。经过几度的附会，就被指实为王世贞了。殊不知同时代的人，就有三种说法，为什么要拘泥于其中之一呢？其实“闻”、“传”，都是当时的传闻、推论，此足见作者隐名埋姓之深，一时难觅其踪迹，难见庐山真面目。但这些传闻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即作品里的西门庆都有模特儿，是和这模特儿接近的门客或老儒取材于他日常生活创作而成，或大名士“指斥时事”而为，都可以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刊行的《金瓶梅词话》中欣欣子序文说的“寄意时俗”，“市井之常谈，闺房之碎语”，“吾友笑笑生为此，爱罄平日所蕴者”互证，大致可以说明这部作品的典型化是有现实基础的，是从实际生活出发进行概括、提炼的。

《金瓶梅》刊板后，早期的苏杭刻本等几个版本我们已看不到，现存的万历词话本欣欣子的序文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。词话本虽杂有京语、吴语，但大多是鲁语，而兰陵又是山东峄县的古称，于是又有人根据这条线索追踪下去。

以上系明人所叙。至清，顺治、康熙时的彭城（今徐州）张竹坡，根据明末清初所传，王世贞曾造书置毒以杀其仇严世

蕃，又重复了《金瓶梅》是王世贞所作，并在他评点的《读法》中冠以贯穿全书“纲领”的“苦孝说”。《金瓶梅》系王世贞所作这一说法，流行了三百多年，影响最大。张氏的鹦鹉学舌，可在康熙乙亥谢颐序的《皋鸣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》本，简称张竹坡评刻本中听到。

此外，清人又提出赵济鹤南星、薛方山应旗作二说，然并无直接佐证。

今人在明人清人的基础上，又有所发挥与进展。一九六三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《金瓶梅》专章的注文，认为“李开先的可能较大”。据李士钊同志不久前告我，文研所的吴晓铃先生即持此说。徐朔方教授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《杭州大学学报》和香港《抖擞》杂志上撰文说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李开先或其门客，因为《金瓶梅》引用李开先的话特别多，很多是一字不改的原句（参《〈金瓶梅〉的写定者是李开先》等文）。作为内证来看，尚不失为有一定根据的推论。一九七九年，朱星先生发表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第三期的长篇论文《〈金瓶梅〉的作者究竟是谁？——〈金瓶梅〉考证（二）》认为“非王世贞教属”。然而他列举的种种材料，无一确证，难以成立。赵景深教授曾撰文指出：“朱星同志这三条是最重要的，都说得不科学。”他同意潘开沛提出的：“《金瓶梅词话》是下层的知识分子、胥吏的集体创作”（参《光明日报》副刊《文学遗产》第18期与《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》所收），并认为“《金瓶梅词话》是民间的集体创作。由于作者是胥吏或失意的文人，所以有的句子比较差。”（一九八〇年第四期《上海师范学院学报》）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他在为拙著《金瓶梅考证与研究》所写的序中，又说“《金瓶梅》是艺人的集体创作”。赵老根据明末张岱《陶庵梦忆》“甲戌……用北调说《金瓶梅》一剧”的话，认为“这种金瓶梅诸宫调

……应该是民间无名氏的创作”、“《金瓶梅词话》以前，应该有一本金瓶梅说唱词话。后来却把这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改为《金瓶梅词话》”他的《金瓶梅》是民间、是艺人的集体创作的看法，与徐朔方教授所见略同，不谋而合。徐先生说，古今认为《金瓶梅》系王世贞所作，这种讲法“不从作品本身去评价小说，而是以书中情节及人名加以主观的牵强附会，开了后来《红楼梦》索隐派的先河”，“不妨设想水浒故事在民间说唱的长期流传中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，其中一个异点就是西门庆、潘金莲的故事……最后由附庸而成大国，形成一部独立的《金瓶梅词话》，然后由文人写定。”这种从文艺内部的源流试加考察，比仅凭传闻的沿袭，要切实一些。在目前暂时还找不到作者的具体可靠的线索的情况下，不失为求证的方法之一。即使由某一作者加工改制，他对民间的说唱和市井坊间流行的时曲戏剧无疑也是很熟悉的。

近年来江苏运河师专张远芬同志发表了几篇《金瓶梅》作者新考的文章，他在一九八二年《抱朴》第五期上刊出《兰陵笑笑生即贾三近》和一九八二年第三期《徐州师范学院学报》上发表《〈金瓶梅〉作者新证》二文，他探索学术的进取精神诚为可贵，惟列举的十条证据均系猜想。他在《峄县方志》、《贾三近墓志铭》上找到的那个兰陵散客贾三近与兰陵笑笑生，贾三近的创作经历与《金瓶梅》的写定，还找不到有必然联系的确证。

有识之士认为，这个问题不是靠逻辑推理可以解决的。笔者同意这种看法。我以为考证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谁，除了按迹循踪外，必须同时回答前人曾经提出过的两点：（一）作者为什么会这么熟悉社会上层尤其是中层、下层的生活，熟悉官场衙门、市井曲巷、经商放债及打醮宣卷等等内情——他必须有广泛的阅历；（二）他怎么会将历史与现实的纷繁复杂的大小事件

有机地组织起来的？他驾驭语言的能力怎么会这样惊人的？他怎么会既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，又熟悉各种文学形式包括民间说唱艺术的？——他必须是大手笔。我们从仅有的一点线索入手，跟着由点到面、由远及近、由外而内地进行探索是需要的，但单从一个侧面，孤立地作印证，或以前人的传闻为出发点，将一些未必有直接关系的材料罗列在一起，想当然地从事考证，都较少可能会将这位隐名埋姓如此之深之久的作者找出来，从而解决本书创作之谜的。辛苦不负有心人。在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指导下，在三百年来学术界的探索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考察的基础上，相信若干年后有可能获得令人信服的结果的。

除了作者，三百几十年来分歧较大的便是对这部“第一奇书”的如何评价了。

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：一曰褒，持此见人数极少，却是名士或具胆识者；二曰贬，各类人都有，从道学先生到大儒、大文豪等，有反动的、中间的、进步的，解放三十三年来学界也多倾向于此，只是说法不同，这是一种占压倒性优势的看法。现择要略予排比。

明人。

现存较早的是处于同时写于同时的沈德符（1578—1642，万历举人）与谢肇淛（1567—1624，万历进士）所论。

沈：“予曰：‘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。但一刻则家传户到，坏人心术，他日究诘始祸，何辞置对？吾岂以刀锥博泥塑哉？’”这是一种看法。

谢：“其中朝野之政务，官私之晋接，闺闼之媒语，市里之猥谈，与夫势交利合之态，心输背笑之局，桑中濮上之期，尊疊枕席之语，狙猿之机械意智，粉黛之自媚争妍，狎客之从夷

逢迎，奴佞之嵇唇淬语，穷极境象，臆意快心。譬之范工抟泥，妍媸老少，人鬼万殊，不徒肖其貌，且并其神传之。信稗官之上乘，炉锤之妙手也。其不及《水浒传》者，以其猥琐淫媾，无关名理。而或以为过之者，彼犹机轴相放，而此之面目各别，聚有自来，散有自去，读者意想不到，唯恐易卷。此岂可与褻儒俗士见哉。”这又是一种看法。

这两种看法，代表了《金瓶梅》成书时当代人的观点，是评价《金瓶梅》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。现在的学者专家讨论《金瓶梅》，基本上还是从沈氏提供的线索出发的；谢氏跋文国内还很少有人看到，近年来才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先生撰文提供。比较起来，沈氏重版本，间及作者，内容与后续，而在评论其倾向性时，虽有根据传闻推叙它的现实意义之处，然给人的印象是在贬，而谢氏则重评价，并涉及作者与源流，且对本书的主题与题材、形象与手法即从思想到艺术，作了全面论述，揭示了《金瓶梅》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与局限，批驳了万历人实际也包括沈德符在内的一些人对《金瓶梅》的谬见，它回答了至今还争论不休的某些问题。其观点鲜明，持论公允，造语峭拔，表现了他的功力与胆识。按当时的认识水平讲，诚属难能可贵，较之被同代誉为“举类迥而见义远”的沈德符之见要高出一筹。谢氏指出《金瓶梅》的这一突出成就，使它跃居为说部的“上乘”，除了“猥琐淫媾”外，它的艺术上的“人鬼万殊”，“面目各别”，则超过了“机轴相仿”的《水浒传》，在人物形象的个性化方面，取得了成就，这是经过鉴别得出来的结论，非为夸饰或谬溢之词。它与张无咎在《北宋三遂平妖传》重刻本的改为泰昌元年（1620）的序里说的，“《玉娇丽》、《金瓶梅》另辟幽蹊，曲中奏雅，《水浒》之亚”，何其相似乃尔！

我们从沈氏的“坏人心术”，谢氏的“有嗤余海淫者，余不

敢知。然溱洧之音，圣人不删，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。”即表明当时文坛对待《金瓶梅》的两种态度。袁小修说“此书诲淫”，而他的哥哥“袁石公亟称之”，双方看法之对立，令人难忘。一是此书不存在万历庚戌年初刻本、抄本、稿本无秽语的问题；二是因为《金瓶梅》这个比较突出的斑点，也给人们评价它造成了困难与分歧。从《金瓶梅》开始流传起，社会上就存在“诲淫”与刺时、“秽书”与“奇书”的完全相反的评价，一直贯穿到清至今，清政府曾明令禁毁，当代斥之为“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”，各级图书馆列为“禁书”而深锢，研究工作几近中断。对于一部充满矛盾的具有复杂思想内容的作品来讲，不同的人生观与艺术观，不同的眼力与方法，加上对中国传统笔法与历史知识的是否掌握，以及政治气候的影响，等等，都可能使人们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。“近来《清纪》、《快书》、《情种》等刻，此皆蜣螂抱虫，宝为苏合者也。”（崇祯五年后肖士玮：《春浮园别录》）《金瓶梅》反映时风的露骨地描写性交与恣意地铺叙房事，无疑开了一个坏头，使后世的没落颓废文学中多了一股色情文学的浊流，不仅导致了《玉娇丽》这类“秽黜百端”的作品的产生，并且影响了后来一大批浮词艳语的小说笔记和清初的猥亵笔墨诸如《续金瓶梅》的出笼。它的虽属第二位的消极面的影响，也是不可抹煞的小说史上的事实。

“仿此者有《玉娇丽》，然而乖彝败度，君子无取焉。”谢肇淛把本书与那些趋于卑下的淫词艳语作了区别对待，划清了两类作品的界限。袁中郎《觴政》称“传奇则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为逸典”（《袁中郎全集》卷十四，十之《掌故》），弄珠客说“若有人读得此意，方许他读《金瓶梅》也，不然石公（袁中郎）几为异淫宜欲之尤矣。”他们都毫无隐讳地揭示《金瓶梅》的淫猥秽黷，但把它与淫书，把作者的“世戒”的创作意图与“诲淫”之旨

分辨了开来。

清人。

继承谢肇淛、欣欣子与弄珠客的讽世斥时的批判传统，清初有人接着说，“即小说一厕，奇如《水浒传》，而不善读之，乃误豪杰而为盗趣；如《西门传》（指《金瓶梅》）而不善读之，乃误风流为淫。其间警戒世人处，或在反面，或在夹缝，或极快极艳，而惨伤寥落寓乎其中，世人一时不解也。”（《豆棚闲话》卷末总评）而影响较大的莫如张竹坡的评点。张氏评点的体裁尤其是他的观点，给了后来的脂砚斋评点《红楼梦》以直接的启示。

张竹坡的评点有平庸陈旧、凿空附虚的一面，它的“以空结此‘财色’二字”与“苦孝说”给了后来评论《红楼梦》的各家以影响，就连那《红楼梦读法》、《石头记读法》，也系模仿金人瑞毛宗岗的《水浒》《三国》读法与《金瓶梅读法》而来。

张竹坡的评点分总评与回评两种形式。前者以《金瓶梅读法》最具代表性，后者以双行批注为主。

“作小说者，概不留名，以其各有寓意，或暗指某人而作……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究委，说出名姓何哉？何其刻薄为怀也。且传开之说，大都穿凿，不可深信。总之作者无感慨，亦必不著书，一言尽之矣……何不留此闲工。多曲折于其文之起尽也哉！偶记于此，以白当世。”（《读法》三十六）追索作者，牵涉到《金瓶梅》的背景和作意，自然引起人们关注，“刻薄为怀”，也透露自晚明至清初《金瓶梅》的流传和人们品议它的热烈风气。虽然没有发现新的材料以作令人信服的论断，但仍然附会臆测，而对作品本身的研究反而被忽视了，张氏这才发出如上的感叹和呼吁。

“凡人谓《金瓶》是淫书者，想必伊止看其淫处也。若我看

此书，纯是一部史公文字。”（《读法》五十三）从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本书，这就比前人和时人甚至后人看得全面深刻。《金瓶梅》反映的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嘉、万时期的一个侧面，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与较新的时代色彩。它着力塑造的新兴商人势力的代表西门庆，是以前的作品从来没有过的新的典型形象，它的交通官吏、结帮成派是对社会关系的真实描绘，它刻划的西门庆亦商亦官、官商一体具有较强的现实概括力，而这些又是通过具有自己特色的艺术手腕表现出来的。一部形象化的嘉靖、万历史，一幅明中叶的人情风俗图，这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价值。张氏虽然不可能看到这些，但他把《金瓶梅》比成一部《史记》，他在第七十一回何太监宴请西门庆，席间三个小厮连师范“唱了一套”，张氏在〔正宫端正好〕“水晶宫，蛟绡帐下”批：“又是宋朝，总是寓言也”，“稗官者，寓言也。其假捏一人、幻造一事，虽为风影之谈，亦必依山点石、借海扬波”（《金瓶梅寓意说》），则已心深眼明地窥出作者以宋寓明之意，而没有把它打成一部淫书，这在当时似乎有那么一点“反潮流”的勇气与胆识。须知具有高见卓识与绝去町畦的大文学家蒲松龄也把《金瓶梅》看作“淫史”的。铸雪斋抄本卷八《夏雪》篇谓：“若缙绅之妻呼太太，裁数年耳。昔惟缙绅之母，始有此称，以妻而得此称者，惟淫史中有此林、乔耳，他未之见也。”按：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四十一回西门庆与乔大户结亲，到李瓶儿房里说：“他家有一门子做皇亲的乔五太太……到十五日也要来走走”，第四十三回便是“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”，第七十二回西门庆初会林氏，便左一个右一个地叫“老太太”不停，第七十八回的回目便是“西门庆两战林太太”：这便是蒲松龄说的“林、乔”的来历。在这里，情深笔健的鬼狐大家也是目之为“淫史”的。乾隆时期的长篇小说家李绿园在《歧路灯》自序中说：